

A large, ornate decorative border in a muted purple color frames the central text. It features intricate scrollwork, acanthus leaves, and floral motifs. Four smaller, circular floral designs are positioned at the corners of the page, outside the main border.

中国基督教 年鉴

本书编委会 编

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A large, ornate floral border surrounds the title. It features intricate scrollwork, leaves, and floral motifs, with a central medallion at the bottom.

中国基督教 年鉴

本书编委会 编

1

國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基督教年鉴(全二十四册)/本书编委会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1

ISBN 978 - 7 - 5013 - 4803 - 9

I. ①中… II. ①本… III. ①基督教—中国—1910 ~ 1939—年鉴—英文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0091 号

责任编辑:许海燕

书名 中国基督教年鉴(全二十四册)

著者 本书编委会 编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 - 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艺斋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828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4803 - 9

定价 12800.00 元

一套全面记录和展示在 华新教传教使团活动的大百科全书

——记《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和《中国基督教年鉴》

沈弘

凡是对于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历史感兴趣的研究者,无不为搜集反映当时新教各传教使团活动的研究资料这一难题而感到头疼。这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原基督教各传教使团的原始档案材料大量失散而造成的,另一方也是由于各国来华的新教传教使团背景过于复杂和名目繁多,让人难以理清头绪。根据伦敦大学狄德曼(R. G. Tiedemann)教授在《基督教在华传教使团研究指南》(*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2009)一书中的统计,在华新教传教使团大大小小共有 239 个,分布在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而且能反映这些传教使团活动情况的原始材料绝大部分现在可能都已丧失,即便仍然存世,也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里。如果有人想要把所有这些传教使团的历史及其在华传教情况的线索全部梳理清楚,这几乎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

不过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确实曾经有人试图着手来做过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位于上海的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中华续行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等几个团体曾联手于 1894—1941 年间编辑和出版了《中国传教使团手册》(*China Mission Handbook*, 1896)、《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907),以及总共 21 期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0—1925)和《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6—1939)。为了做好这些事情,驻扎在上海的一些西方新教传教使团元老级人物曾在全中国范围内广发英雄帖,要求每一个新教传教使团的负责人和普通成员提供各自传教使团的历史和日常传教活动的信息,并且召集了当时活跃在传教事业第一线的各国传

教士和中国教会中坚人物为上述这些书籍和《年鉴》撰写文章和编纂各方面的统计数字。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这些出版物仍堪称是千百人呕心沥血的里程碑之作。因为每一期《年鉴》的撰文作者人数都达40至80多人,文章的内容不仅涉及到了各主要传教使团在华活动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外国传教士们和中国教会领袖们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看法,其价值丝毫不亚于一套全面记录和展示在华新教传教使团活动的大百科全书。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独具慧眼,决定影印出版这一套现在很难找全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和《中国基督教年鉴》及其前身《中国传教使团手册》和《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此举无疑是对西方在华传教士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是该领域研究者们的一个福音。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们了解和利用这一套珍贵的历史素材,本文作者将在下面的几个章节里追溯这套《年鉴》编写过程的背景情况,并且撮要介绍《年鉴》中一些颇具特色的文章内容。

一

在1860年以前,在华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基本上只限于少数几个开放口岸,其发展自然十分缓慢。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后,清朝政府被迫将中国全境向西方传教士们开放,欧美各国的基督教传教使团开始逐渐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内地的各个角落。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新教各个传教使团的信息十分闭塞,相互之间得不到充分的交流,所以人们对于大清末年中国境内的基督教传教情况很难有一个全面的印象。

1874年8月,在华长老宗属下的几个传教使团在山东芝罘召开会议,与会的除了各国在华长老会传教使团的代表之外,还邀请一些其他新教传教使团的代表。大家坐在一起商讨如何加强各长老会传教使团之间,以及长老宗差会与其他教派差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当时正值传教士们避暑休假的季节,所以正在芝罘休假的不少其他差会的传教士们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会议期间还专门举行了一系列的晚间座谈会,听取来自各地传教使团代表的报告。正是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报告使得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召开一次所有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当这一想法在会上被提出来之后,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于是会议组织者就这一议题又举行了几次专门会议,并指定倪维思(J. L. Nevius)、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和海雅西(J. B. Hartwell)这三人起草了一个发起召开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并将其送达每一位在华的新教传教士。通知中除了提出会议的目标和内容之外,还建议由长江沿线的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各省各选派出一名代表,以便组成会议的筹委会。选派结果是以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代表香港和广东,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代表福建,巴特勒(J. Butler)代表浙江,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代表江苏,杨格非(Griffith John)代表长江沿岸各港口城市,狄考文(C. W. Mateer)代表牛庄和山东,艾约瑟(Joseph Edkins)代表直隶。这个新的大会筹委会中有五位代表于次年10月25日在上海开会,他们在审理了许多相关文件之后,决定于1877年5月10日在上海召开首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并为此制定了一个为期11天的会议日程表,其中明确列出了每一天会议的议题和指定撰写相关报告的人员名单。

首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参会的142名代表分别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新教传教使团,他们在会上就翻译《圣经》的术语、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交换了意见,并在教育、反缠脚、反鸦片和传教方式等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和合作的意向。通过广泛的交流,这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还初步摸清了全国基督教各传教使团的大致情况。在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还列出了反映全国各新教和天主教传教使团现状的统计数字表格。

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是于1890年5月7—20日在上海召开的,与首次大会相隔了近13年。当时有很多人觉得光靠这样的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来进行交流还远远不够,认为很有必要编纂一本可随时供人查询和参考的《中国传教使团手册》。于是在华传教士联盟(China Missionary Alliance)的本特利(W. P. Bentley)、美国监理会的冯昌黎(W. B. Bonnell)、美国北长老会的费启鸿(G. F. Fitch)、美国北长老会的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和美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五位资深的上海传教士便牵头于1894年联合撰写了一份传单,并将其分别寄给了全国新教传教使团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提交各自差会来华传教简要历史的报告,填写1893年间本传教使团的各方面数据,并且绘制本传教使团已经开展传教活动的基本区域地图。上述五位资深传教士也各有分工:所有提交的各传教使团历史沿革报告全都寄给李提摩太,由他进行编辑和改写;有关教育方面的报告和数据交由冯昌黎处理加工;医疗方面的报告和数据分别寄给费启鸿

和本特利进行编辑；而那些手工绘制的地图则统一寄给美华书馆的负责人金多士去加工印制。经过全国各地传教士们的集体努力和五位编者的精诚合作，《中国传教使团手册》一书最终于1896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该书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李提摩太等人撰写的文章所构成，分别介绍儒、佛、道、回等中国宗教的背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各地发生的教案等情况；第二部分则是具体介绍在华新教各传教使团历史、发展和现状的文字描述、统计数表和地图。这本手册首次向读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45个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概况，迄今仍具有很好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1905年8月，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撰文指出，将于1907年召开的新教传教士来华百年纪念全国代表大会筹委会最初提出要指定一位专人来撰写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百年史，但是在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一位作者，既具有广阔的视野，又能兼顾到琐碎的细节，从而可以为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新教传教使团在前后100年中的活动勾勒出一幅包罗万象，而又细节生动的全景图画。

于是大会筹委会决定采纳11年前编纂《中国传教使团手册》的做法，即跟每一个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负责人进行联系，让对方准备一份关于本传教使团在华传教活动的简要历史叙述，然后将其集中到位于上海的广学会来进行编辑整理，以便最终形成一个单卷本的《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

在最初发出的通知中规定，每一个传教使团历史叙述的长度限制为4000字。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各传教使团的大小规模和历史长短相差很大，很难用同一个框架去套它们的历史。于是在第二份发出的通知中对此规定进行了调整：4000字的长度只是作为一个平均数，那些历史比较悠久的传教使团可以得到更多的篇幅，而其他的传教使团则可能被删减到4000字以下。

1906年1月，来自加拿大长老会的广学会干事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被正式指定为该传教历史卷的主编，担当起了编纂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这一历史的重任。然而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如果要赶在大会召开之前出版该书的话，就决不能坐等别人交来的报告。几乎没有一个传教使团能够准时交来预定的报告，有的传教使团甚至在规定的时间内只字未写，还有的则要求上海方面派人去其传教地区亲自进行调查。于是季理斐又发出新的通知，详细说明需要

什么样的文字材料。此外,他又发出了一系列的催促文件,以确保那些动作缓慢的传教使团能及时交来报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原始的报告终于都收齐了。季理斐又担负起了对这些材料进行重新组织和改写的全责。由于上述不可避免的原因,书中对于每个传教使团在华历史的描述长度相差较大,有的非常翔实,有的则过于简单。

关于各个传教使团现状的所有统计数据全都被转给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毕顿(Nelson Bitton),由后者将其制作成了各种大型表格和权威数据。总的来说,该书比11年前出版的《中国传教使团手册》又前进了一大步,总共收入了99个新教传教使团的详细历史资料,而且文字描述和统计数据比起前一本书来也更为翔实可靠。

二

尽管《中国传教使团手册》和《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这两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历史和现状,但是清末民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的形势日新月异,西方在华新教各传教使团的发展也十分迅猛,以至于许多刚刚得出的统计数字和绘制的传教区域地图一出台便已过时,成为了明日黄花,所以往往很难客观而准确地把握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动态。

在这一方面,日本的西方新教传教士们显然要比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做得更好。从1903年至1910年,日本的西方传教使团已经连续8年出版了一部题为《日本基督教运动》(*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的《年鉴》。该《年鉴》简要记录了西方新教各差会在日本的传教工作情况。1909年去日本参加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归来的明恩溥在《教务杂志》第40卷(1909年第12期)上发表文章,专门介绍了这部记录基督教在日本传播史的《年鉴》:

我们应该关注由东京美以美会书馆出版的《日本基督教运动》第7期《年鉴》,该书有614页。这部《年鉴》的出现已经成为日本基督教传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已经成为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在主编格林(D. C. Greene)博士不在日本的情况下,最近两期的《年鉴》分别出自克莱门特(E. M. Clement)教授和青年会的费希尔(Galen M. Fisher)先生

这两位能干的编辑之手。书中关于过去一个年度中政治和其他社会形势的回顾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于理解其他方面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全书分为25个章节,涵盖了对于日本每一个重要的宗教运动的回顾,而且在以后的《年鉴》中还将包括朝鲜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内容。书中还有介绍最新情况的19个附录、21页经过仔细编辑的传教使团统计数据、一个在日本(包括台湾)^①和朝鲜的地址经过更新的西方新教传教士完整名录、一个拥有各种传教使团的城市名单,以及一个教会学校的名录、一个教会期刊的名单和一个教会慈善机构的名单,另外还有一个索引。(第717—718页)

明恩溥在该文结尾处大声疾呼地号召在华新教传教士们也来编纂一部相类似的中国基督教运动的《年鉴》。

位于上海和作为基督教文献出版机构的广学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编纂这样一部《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重任。该《年鉴》的主编仍然由《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一书的主编季理斐来担任。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日本由于国土狭窄,所以调查工作做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中国幅员辽阔,新教传教使团的数目和传教士的人数均是日本的几倍,所以编纂《年鉴》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所以最初出版的《年鉴》注定不会是十分完善的。但幸运的是,编纂《年鉴》一事得到了大部分在华新教传教士的支持。光是预定这部《年鉴》的人数就达到了300多人,这说明有许多人对于这部《年鉴》的诞生是抱有极大期待的。

按照《日本基督教运动》的模式,首部《中国传教使团年鉴》(1910)共分为30个章节,然后是10个附录部分,外加“在华传教士名录”和统计数字图表。

书中这30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分别是:1)过去一年总的形势回顾;2)重要法令和政府的变化;3)国立学校;4)上流社会的传教工作;5)教会男校和教会男子学院(大学);6)各个差会传教工作;7)在城市里的传教工作;8)独立和自助的教会;9)医务传教工作;10)医学教育和研究;11)神学教育;12)《圣经》学习运动;13)主日学校;14)妇女传教运动;15)妇女教育运动;16)宗教复兴;17)联盟与联合;18)广学会;19)圣教书会;20)基督教期刊;21)教会印刷所和出版社;22)圣经公会;23)《圣经》的翻译和改编;24)特殊的慈善活动;25)职业学校;26)禁烟运动的进展;

^①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台湾曾一度被日本吞并。

27)青年会;28)国外的中国人;29)东正教会;30)天主教传教使团的统计数据。

共有 50 名左右能干的作者为这部《年鉴》提供了署名文章,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协助这些作者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从书中的文章和数据来看,有许多作者的调查研究和文笔都是相当出色的。例如撰写“形势回顾”的作者明恩溥便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通和作者,他所撰写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曾受到鲁迅的极度推崇。在回顾 1909 年中国政局和社会形势时,他以犀利的文笔剖析了清末错综复杂的政局:一方面以铁路建设为代表的清末经济建设、以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纷纷建立为象征的宪政改革,还有禁烟、反缠脚、办女学等代表民族自强精神的社会改造运动均有长足的进步;而另一方面,1909 年的长沙新军起义也使他心有余悸,预感到清王朝风雨飘摇,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

书中有近一半的章节跟教育问题相关,这说明了西方新教传教士们对于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他们除了关注神学教育之外,还非常重视普通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此外还十分关注医学和职业教育,尤其是对于女子教育和残疾儿童教育的重视,所有这些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显然是具有正面意义的。

首部《年鉴》中有一些章节为西方新教传教使团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珍贵史料,例如在第 18 章季理斐对于广学会由来的介绍中关于该组织内部人事变动的一些细节便是别处很难见到的。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在第 20 章中对于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基督教期刊也有不少是本文作者以前所不知道的。金多士撰写的第 21 章中对于上海美华书馆、上海华美书局、福州美华书局、汉口苏格兰圣经书会印刷所、美国公理会福州格致书院印刷所、广州美华浸信会印书局、四川华英书局、通州协和书院印刷所、福建兴化美国圣公会印书局、汕头大英长老会印书局、台湾大英长老会印书局等教会印刷所和出版社的介绍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附录 10 个部分内容分别是:1)1908 年 6 月—1910 年 5 月的中国大事记;2)1907 年—1910 年间在中国去世的西方新教传教士讣告;3)关于中国的外语新书名单;4)1908—1909 年间西文期刊杂志中关于中国的文章;5)对《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一书的勘误和补遗;6)教会负责人名单;7)上海亚洲文会;8)中国百年纪念传教士代表大会组委会的报告;9)1907 年传教士大会之后新开设的传教站名单;10)哈雷彗星在中国。

对于研究来华传教士生平和在华新教各传教使团的人员分布情况来说,《年

鉴》附录中的“讣告”和“教会负责人名单”，以及位于10个附录之后的“在华传教士名录”这三个部分都非常有用。讣告往往是对一个传教士生平的简单介绍和对其评价的盖棺定论。在教会负责人名单中，我们不仅能够查到当时在华新教各传教使团的负责人名单，而且还能查到教会大学校长和其他文教机构和出版社的负责人和期刊、报社主编的名单。“在华传教士名录”则是对于当年在华新教传教士人数的最全面和权威的统计，除了能够查到近3000名传教士的名单之外，还可以查到91个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名单。

虽然这部厚达近600页的《年鉴》涉及到了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各个方面，但它也注定不是面面俱到的。例如在介绍教会学校发展情况的第5章中，作者不可能列举全国所有的教会学校；名为“各个差会传教工作”的第6章中只是撮要刊登了20个新教差会的年度报告，由于篇幅的关系和可操作性问题，《年鉴》编纂者和撰稿人不可能将每一个方面的情况都事无巨细地全部列举出来，只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取舍。

首部《年鉴》出版之后，好评如潮，并在很短时间内便已售罄。广学会再接再厉，很快又推出了仍然由季理斐主编的第2期《年鉴》。在这本书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第3章“新产生的中国宪法”和第4章“中国的悲哀”。前者是对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一个评述，后者则介绍了中国境内的各种骚乱、饥荒和瘟疫，包括在满洲里横行一时的鼠疫。由于时局动荡，民族思潮、排外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在清末的中国得以迅速兴起和传播，该书第6章针对“中国学生在读什么？”和“中国青年在想什么？”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社会调查。在华传教工作显然是这一部《年鉴》的重点，因为书中过半数的章节都跟传教活动有关，如第8章“中国大学中的传教工作”、第9章“在华医务传道会”、第10章“在上流社会中的传教工作”、第11章“当今中国教会所面临的问题”、第12章“中国学生志愿传教活动”、第13章“传教士尚未涉及的地区”、第14章“在少数民族部落的传教工作”、第15章“满洲里的传教工作”、第16章“台湾的传教工作”、第17章“广东省的传教工作”、第18章“华北循道合会50周年庆”、第19章“德国在华传教使团的工作”、第20章“内地会的传教工作”、第21章“北欧在华传教使团的工作”、第22章“其他传教使团的传教工作”、第23章“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工作”、第24章“传教士们的意见”、第30章“在妇女中的传教工作”等。

由于季理斐于1912年回国休假，所以这一年的第3期《年鉴》是由伦敦会传教

士和英国圣书公会在华代理人文显理(G. H. Bondfield)所主编的。由于当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所以在这一部《年鉴》的内容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在第2章“政府的更迭和全国性运动”中,英国报人李治(W. Sheldon Ridge)对于革命前夕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如资政院和皇族内阁的成立、保路运动和改革运动,以及辛亥革命本身的几个重要阶段,如关于租界的谈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清帝退位、袁世凯篡权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阐述。由于李治身为受袁世凯津贴的《中国公论西报》主笔的身份,所以对于革命时期一些重要事件的内幕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在第3章“辛亥革命”中,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英文部主任的海归邝富灼博士(Dr. Fong F. Sec)也对辛亥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综述。这两个章节以不同的视角审视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生动的描述。

从1913年至1915年这3部《年鉴》依然是由季理斐主编。1913年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年初召开了第五届在华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开会的方法跟以前都不相同:首先是2月份在广州、上海、济南、北京和汉口分别召开了区域性的代表大会,相当于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出席这些区域性会议的代表人数在70—80之间,他们所代表的是周边数省的各个新教传教使团,每个区域性会议的会期都是5天。在华基督教全国代表会于是于3月份在上海召开的,由1910年爱丁堡普世宣教会议(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主席穆德(John Raleigh Mott)博士亲自主持。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传教士代表人数共115名,他们代表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35个新教传教使团。这些代表中有2/3的人数是由各个区域性代表大会选派的,而其余1/3是由全国代表大会的组委会指定的。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议题、讨论情况和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参见1913年《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第2章“1913年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

这次在华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还有一个新颖之处就是在大会结束之后,就紧接着成立了中华续行委员会,来具体执行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达成的各项决议。1910年在爱丁堡召开的普世宣教会议上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所以这次穆德博士来华主持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就把这种组织模式也带到中国来了。根据在1913年《年鉴》附录中所刊登的《中华续行委员会宪章》,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有以下这5个:1)代表爱丁堡续行委员会来执行1913年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所达成的一些提案;2)帮助沟通中国基督教力量与爱丁堡续行委员会、其下属特别委员会和西

方传教董事会之间的联系;3)作为中国基督教力量向外界联合表达自己看法的一个媒介;4)推进中国基督教力量的联合和协调;5)在必要时可以成为一个咨询委员会。

在1914年《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第30章中,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外籍干事罗炳生(E. C. Lobenstine)撰文介绍中华续行委办会成立和其后一年内的工作情况。首届中华续行委办会全体会议是1913年3月由穆德博士亲自主持召开的。按照规定,该组织成员的人数在40—60之间,其中必须有1/3是中国人。首届中华续行委办会共有51名成员,到了1913年年底又增加到了58名,其中有20名是中国人、18名来自英国和加拿大、17名来自美国、3名来自欧洲。这些成员分别来自14个行省和24个不同的传教使团。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大部分具体工作都是通过下属10个特别委员会来进行的,这些特别委员会分管调查和统计数据、中国教会及其联合、推进传教运动、神学教育、主日学校的工作、基督教的社会应用、基督教文献、统一的术语、赞美诗集和祈祷书、传教士训练、商业和行政效率。此外,中华续行委办会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从广学会那儿接管了《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编纂工作,由它负责指定该《年鉴》的主编和编委会成员的人选。

在1915年《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序言中,主编季理斐透露了自己萌生退意的想法。他抱怨说,自己除了编纂这本《年鉴》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工作。当他最初接受该《年鉴》主编工作时,并没有料到这项工作竟会占用他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其潜台词就是他已经感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想要辞掉《年鉴》主编这项工作。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1916年和1917年这两部《年鉴》中,我们发现主编的名字从季理斐改作了罗炳生,但是中华续行委办会在主编之上新设立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协助《年鉴》主编的编纂工作,而编委会主席一职却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列于编委会之首的季理斐身上。就这样,季理斐终于完成了他从台前到幕后的角色转换。

罗炳生是中华续行委办会的美籍干事和北长老会传教士,年纪要比季理斐小10岁,来华时间也要晚10年,所以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出任《年鉴》主编这一职务之后,便立即对原来的《年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版。他把1916年的《年鉴》分为11个板块,共47个章节;1917年的《年鉴》更是分为12个板块和60个章节。然而最大的变化是在于1916年的《年鉴》中省略了“在华传教士名录”这一重要的内容。这是因为在华西方传教士的数量迅速增加,所以罗炳生认

为这一部分在《年鉴》里占用了过多的篇幅。于是他决定让由中华续行委员会鲍引登(C. L. Boynton)负责编纂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名录》单独成册付印,每年都跟《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同步出版。

在罗炳生所主编的上述这两部《年鉴》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新的内容,如介绍“中国归国留学生”、“中国妇女杂志”、“从最近的报刊文章看中国的新思潮”、“工会和合作社运动”、“苏州的慈善机构”、“北京的社会改革协会”、“政府颁布的注音简体字系统”,等等。但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刚刚进入中国的“罗氏医社”(The 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连续报道。

其实在1915年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第19章“在华的医师传教士工作”中,就简短报道了1914年来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委员会一个三人小组的调查报告。这个三人小组实际上就是在北京刚刚设立的罗氏医社创始人,其中的贾德森(H. P. Judson)医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格林(R. S. Greene)是罗氏医社的执行主任、皮博迪(F. W. Peabody)医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报告称赞在华现有的教会医院工作情况良好,并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在华的教会医院提供财政援助。报告还建议基金会每年向中国学生提供6个每年1000美元的医学院奖学金名额,同时也向在华医师传教士们提供一些奖学金的名额,以便使他们也有机会去美国或欧洲的医学院深造。在1916年《年鉴》第28章“罗氏医社”中,格林撰文报道说,针对前述三人小组的报告,罗氏医社于1915年9月又派出了巴特里克(Wallace Butterick)主任、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教授韦尔奇(William H. Welch)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医生这三位高层人士,在先期来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普通教育委员会主席盖茨(Frederick T. Gates)的陪同下,深入到奉天、天津、北京、济南府、汉口、长沙、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香港、广州等地,实地考察三人小组报告所提出的医学教育计划中的各项具体建议,并与当地的教会医院和教会大学医学院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会谈。

在1915年至1916年间,罗氏医社在中国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20万美元的价格从英国伦敦会手中购得原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并投入巨资对其进行了扩建和改造。另外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它向位于济南府的共合医道学堂捐赠5万美元,用以建造教学楼和购买仪器设备,另有1万美元是用于在未来5年中维修楼房和仪器设备。191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府正式成立之后,共合医道学堂便成为了它的医学院。

在1917年《年鉴》的第45章中,格林继续撰文介绍罗氏医社在过去一年中的工作进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迅猛发展:罗氏医社正式聘请麦克莱恩(Franklin C. MacLean)教授为协和医学院院长,后者曾经在俄勒冈大学任病理学教授,并且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医院当过医生,是一位医术精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育家。麦克莱恩院长走马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访和考察了中外现有的一些医学院,并回美国去为协和医学院招聘教员和准备扩建校园建筑的计划。与此同时,北京协和医学院利用北京现有教会医院医生的资源,为本校学生开设了妇科学和产科学的新课程,并且与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合作办学,让男女学生在一起上课和做解剖实验等,在中国开启了男女共校学习的先河。

罗氏医社援助其他在华教会大学医学院和教会医院的计划也相继全面开花。它向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提供了资助,用以支持圣约翰医学院的一位教师赴美国宾州医学院进修学习,以及建造学生宿舍和解剖实验室。它向金陵大学校医院提供了一项以五年为期的资助计划,每年向后者注资9250美元,用以支持医院聘请一位医生和三名护士的费用,以及其他维护医院设备的费用。它还为该医院增加建筑面积和医学设备提供了一笔25000美元的捐赠,条件是金陵大学也得拿出一笔数目相同的资金来与其配套。它向上海的红十字医院提供了一笔为期两年的资助,以便能让中国哈佛医学院的学生们到该医院参加实习。它向湖南湘雅医学院提供了一笔每年16200美元的长期资助,此外它还在1916—1917年间向湘雅医学院额外注资30000美元,以便后者能建造教学楼和装备试验室。它向广州的一家教会医院提供了一笔为期5年的资助,每年4500美元。此外,它还为自主医师传教师进修学习、医学院学生的奖学金,以及其他教会医院的聘请人员和设备维护等项目支付了高达数十万美元的巨款。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支持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过去一直没有得到我国官方的承认,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

罗炳生在连续两年主编了《中国传教使团年鉴》之后,显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此后两年的《年鉴》都是他与时任上海世界青年会总干事的美国归正教会传教士苑礼文(A. L. Warshuis)合编的。从1918年起,《中国传教使团年鉴》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每一部《年鉴》的出版日期从每年的8月改为12月,这样《年鉴》所包含的内容就从上一年6月至同年6月变成了从上一年10月至同年10月。其次是由于纸张价格上涨的缘故,《年鉴》的篇幅有所缩减,但是其基本框架

和内容仍然保持不变。

在1918年《年鉴》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当属美国著名女传教士麦美德(Luella Miner)为第41章撰写的文章《妇女在中国新教传教运动中的地位》。麦美德是少数几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在华女传教士之一,而且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她已经有30多年在华传教和办学的经历,所以她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及的事实和观点是在别处难以见到的。对于在华女传教士的研究者来说,这应该是一篇必读的重要文献。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即妇女在中国基督教传教士上的地位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她以雄辩的口吻向读者提出诘问:尽人皆知马礼逊于1807年就来到了中国,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妻子玛丽(Mary Morton Morrison)也是早在1809年就来到了中国,而且她的坟墓就位于丈夫的墓地旁边?

一般在中文史料中提及最早创办的中国女学时,往往会引用郭实腊夫人于1835年在澳门创办的一个女学。可是麦美德告诉我们,早在1825年,英国女传教士戈兰特小姐(Miss Grant)就已经在新加坡开办了一个中国女学。1837年,英国远东女子教育会的阿尔德茜小姐(Miss Mary Aldersey)在爪哇又开设了另一个中国女学。4年后她将该女学迁到了广州,1843年她又将它迁到了宁波,到1852年时该女学已经初具规模,有了40名学生。

美国圣公会(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是从美国最早向中国派遣未婚女传教士的。早在1845年,吉励莎小姐(Miss Eliza Gillete)、钟爱玛小姐(Miss Emma Jones)和莫玛莉小姐(Miss Mary Morse)这三位女传教士就被派遣到了上海。1851年派来的一位女传教士斐理雅小姐(Miss Lydia Fay)因精通汉语和熟读中国经典而在卫三畏所编《汉英韵府》(1874)的序言中专门受到过表彰。她所办的一个男塾后来发展成为了圣约翰大学的前身。伯驾夫人(Mrs. Peter Parker)1842年就随丈夫一起来到了广州,并在那儿开展了传教工作。泰勒小姐(Miss Annie Taylor)和赖哈特(Susan Rynhart)医生不顾个人安危,在西藏、福建和华北等地参加传教工作,成为了女传教士们的表率。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的死者和幸存者中有不少都是女传教士。1878年首先进入甘肃省的内地会威尔逊小姐(Miss Wilson)和1897年率先进入湖南省的内地会雅各布森小姐(Miss Jacobson)分别成为了新教传教运动中的先驱者。早在1883年,英国圣公会泽纳那传道会就派遣女传教士到福建省来进行传教活动,到了1907年时,那儿已经有了47名女传教士。

1860年,美国成立了“女公会”(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从1868年起,它便派遣女传教士在华开展传教活动。从1881年起,该组织在上海的一个活动中心就是上海的裨文女塾。裨治文夫人(即最早来华的美国女传教士吉励莎)后来又在北京开办了贝满女塾。女公会在上海的另一个活动中心是罗丝娜医生(Dr. Elizabeth Reifsnyder)1882年创办的妇孺医院(Margaret Williamson Hospital)。

女传教士们在华创办的慈善事业也是新教传教运动中的一大亮点。例如她们在中国办了许多针对残疾儿童的学校。1827年来华的郭实腊夫人就曾经在广州拯救过六名盲童,并将她们送到国外去治疗和念书。美国北长老会女传教士赖马西(Mary W. Niles)1891年在广州开办了一所残疾女童学校,到1918年时,那儿已经有了115名残疾女童。全中国共有11所专门为盲童开办的教会学校,其中最著名的一所在北京。威尔斯太太(Mrs. Wells)在芝罘开办的聋哑学校不仅从1898年起共救助并教育了数百名中国聋哑学生,而且它还使许多中国教育界的人士受到启发和鼓舞,进而开办了他们自己的聋哑学校。美以美会的女传教士蒲星氏(Mrs. Brewster)创办的麻风病院和邦内尔小姐(Miss Bonnell)1901年在上海开办的济良所(Door of Hope)和华童避难所等均为当时颇负盛名的慈善机构。1913年的《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就曾对受到上海济良所保护的300多名女童进行过专题报道。福州的夏咏美(Emily D. Hartwell)和卫玛玳小姐(Miss Wiley)所创办的大型孤儿院以收养辛亥革命之后赤贫如洗的满族儿童而著称,后被福建省省长报请中央政府为其授勋。《基督教先锋报》属下的福建工读孤儿院收养了两百多名孤儿,当时福建省政府每年都拨付几千大洋来进行财政支持。

在改良社会风俗方面,女传教士们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所领导的天足会为反缠足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73年,美国归正会在厦门与40多名妇女签约,以保证不再让她们的后代再遭受缠足的痛苦。广州的真光学校1890年的92名住校女生中,只有7人是缠脚的。在许多教会女校中,早就规定了缠脚女生不得入校。还有上海的费启鸿夫人(Mrs. G. F. Fitch)与北京的富善夫人(Mrs. Chauncey Goodrich)曾共同发起了反酗酒和反对多妻制的运动。女传教士们的这些活动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在1919年的《年鉴》中,也有一些很吸引人的内容。例如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